

●二十一世纪中国学人文库



上海文艺出版社

熊十力  
是  
中国  
现代哲学家  
思想史工  
最具有原创性  
又最能密  
哲  
历史与文化心灵  
与思想的  
一个哲学  
他  
对于  
东方文明  
有明确的阐发  
他的  
试看新印  
星系  
爱子



# 大激变

## 与众汎

胡晓明 编选

熊十力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ART PUBLISHING HOUSE



熊十力集

大舜

与  
众  
汎

胡晓明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官 超

二十世纪中国学人文库

大海与众沤——熊十力集

胡晓明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875 插页 6 字数 363,000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321-1740-5/I·1408 定价：28.50 元



作者像

無為相以無  
相之相以空  
空形生氣而雖  
現為有鳥而不

可謂身為之相  
色為有形僅如  
水成冰之相空固  
不可說水相卽是冰

作者手迹

## 前　　言

胡晓明

1933年，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下一段话：

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sup>①</sup>

这是陈先生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个精辟、深刻的大判断。其要义有三：（一）明确点出以宋明理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是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一个承前启后的学术文化中轴。（二）“新儒学”一名的建立。所谓“新”，不仅包含了儒学与道家、佛家思想的融合，以及往后的发展（顾、黄、王），而且预示了它在三十年代以后的发展。（三）陈寅恪先生的这一句大判断，具有一种纵贯宏深的历史

---

<sup>①</sup>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文化睿识，昭示人们看学术史，要看其前后贯通处、波澜壮阔处；看学术思想史上的任务，要看其是否对于如此一个“至繁至久”的大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打通，有没有真正的消化，如果没有，就只是一种横断的学术或半截的学术。

无独有偶，三年之后，熊十力在《十力语要》卷二中提到：“释迦牟尼为一大事因缘出世。王船山先生自题其座右铭曰：吾生有事。此是何等襟怀！吾人可不猛省？”1937年，熊十力在同书卷三中又写下一段话：

儒者之学，唯阳明善承孔孟。阳明以天也、命也、性也、心也、理也、知也、物也、打成一片。此宜深究。程朱支离，只在将心性分开，心与理又分开，心与物又分开。阳明大处、深处，不独攻之者不识也，即宗之者，又谁能识其全耶。……吾无精力多写。汝好自作人。宏斯学者，吾不能无望于汝与唐君毅。大事因缘出世，谁不当有此念耶？<sup>①</sup>

在这里，熊氏又用了“大事因缘”一语。熊十力看过陈寅恪文，这是可以肯定的。两个对于中国学术思想有深切关心与相同心事的学人，在这里，发生了一种鲜为人知的心灵的感通与呼应。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那伟大的学术心灵之间的感通，不再是一件孤独的事情，那一份相同的关念，亦不再只是一种内心的企望，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件真切的事实：熊十力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思想史上

---

<sup>①</sup> 《十力语要》，1947年湖北印本，下同。

最具有原创性、又最能够活转历史文化心灵与理想的一个哲人，他的学术，成为当代本土思想资源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

## 一、存在感受与学术性格

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熊十力的哲学特点。直接予人以惊奇、一个细小而颇具深意的现象，即他在其代表作《新唯识论》写成时的署名：“黄岗熊十力造。”郑玄“造，谓作新也”（《礼记·玉藻》）；又在佛教的用语中，唯有菩萨方可“造”佛经。

一个“造”字，我们常常听人从正面说到，熊十力这个人不平凡、有气魄；亦听人从反面说到，熊十力这个人是个狂人。我们先将这两种表面的说法暂置一边，这一个“造”字，平心而论，不也同时表明了熊十力的“有幸”么？他有幸生活在一个旧的道统套套已经崩解毁坏，而新的哲学套套又没有形成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再去“玩弄光景”，因为昔日已“造”好的光景已不复可玩。一切都有待于重新创造，有待于从混沌中凸显一个清晰与明朗，时代有一种隐隐的呼唤。可是，这个时代却有许多人只是从事于所谓“磨刀霍霍”的工作，而没有能力或不愿从事真正的“创造”。《十力语要》有一条记：

夫知识论，固为探求本体者所必资，然后人却专在知识论上玩弄。遂至于讳谈本体。西人有警语云：磨刀所以宰羊。今磨刀霍霍，而无羊可宰，岂非怪事？今之喜玩

弄知识论，而不承认有本体者，其迷谬正如磨刀之喻。<sup>①</sup>

熊十力还有一个喜欢说的话叫做“觌体承当”。他要拿出一个“体”来，应合这个时代隐隐的一种呼唤；他要拿出来的这个“体”，首先是要用自己的生命人格来“承当”的。熊氏由自己的个性气质、时代感受、历史文化意识而外显融凝、觌体承当为一种哲学，有声有色、有力量，有生命的风姿，直接与他的整个人格相印相证相通。金岳霖先生当时曾一语中的说：“熊十力哲学中有人！”熊十力分明是一个“兴于诗”的哲人，而不是一个“立于礼”的哲人。这个“诗”，正是我们这里说的“存在感受”。不从这里去看，可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真正懂得熊十力的哲学。

首先，熊十力的存在感受源自于时代忧患意识。中国自清朝以来，文化理想即失落。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由于长期积弱，国势岌岌可危。同一时期，当代西方的科学思潮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有极大影响，科学一元论的泛滥以及二十年代“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反拨，是这一时代学术文化思想的主要脉动。熊十力不仅如张君劢、梁漱溟等人那样尖锐地洞察到科学主义并不能包办社会政治人生等问题，不仅比他们对于东方文明有更为准确的阐明，而且，他的忧患意识显然超越了他的同时代人。他说：

少时读孟子，我亦欲正人心一语。不感何种意味。  
三十而后，深历世变，始知此言直抉本根。万化生于人

---

① 《十力语要》卷三。

心，人心正，则万事万物莫不一于正。人心死，则乾道息，尚何事物可言。中国至于今日，人理绝、人气尽、人心死。狼贪虎噬。蝇营狗苟，安其危、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天下皆是也。举一世之人而皆丧其心，所冀能反讲本心者，士大夫耳。上庠教者、学者，皆士大夫也。设问此辈终日终夜所孳孳者何事，除为其一身名声与地位及温饱而外，其胸际果揭然而存、惻然而感、念念与斯人痛痒相关否，其有玩心高明、万理昭晰之一境否。或则憤政俗之弊，激动昂之情，投足党团，高自标举。随顺时风众势所趋，以改造之英自负。而是否出于惻怛之诚、公明之识、沈毅之勇，则稍有识者，当知不类。如萍无根而生，如蓬依风而转，如菌因腐而发，终于鱼烂而亡，一任强者宰割。自清季以来，士大夫无真识定力，无实肝胆，狂昏浮乱，以至于今而莫知所底。吾痛心久矣。<sup>①</sup>

直抉“人心”、“人理”、“人气”，这是他最深切的大忧患。那些参加“科玄论战”的人，多半一心只忙着应付来自西方的思潮，焦虑地思索着对策，只有熊十力，将生命与时代打并在一团，如是如是地发生一种痛感，看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正是人心的迷失。只是，熊十力为何如此真切地将他的生命与时代生命之间融通而发生痛感呢？我们由此可以进而论他的存在感受与历史文化意识的关系。

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事实是，由于救亡保种的时代内驱力，自“五四”以还，极端的西化论者把中国的全部积弱归咎

---

<sup>①</sup> 《十力语要》卷三。

于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儒家思想竭力抨击，于是在涤荡封建余孽的革命同时，亦对于传统中富有生命的气脉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起码的精神支柱亦被破坏。除梁漱溟等少数几个人，没有人再肯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处、大处，说一句公道话。熊十力思想中，不仅传统的血脉没有断绝，而且，纵贯的历史文化意识特为宏深。在《十力语要》中，他念兹在兹地提到王船山、王阳明，大都不仅仅从知识意义、从学养意义上作一些引经据典的工作，而是一种亲切的存在感受，以及一种自觉的接续慧命的精神：

记得我少时看王阳明《大学问》，自以为解得，当时确是以不解为解，如今倒是真解得。……（复问：师今日见地，果自阳明入乎？）曰：难言也。谓吾自阳明入，不若谓吾自得，而后于阳明之言有深入也。<sup>①</sup>

吾侪留得一口气，当时时刻刻有船山亭林诸老的精神，慎勿稍怠。今日，比诸老时代所负责任，更大得无比。<sup>②</sup>

同样是民族文化意识，他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反而是文化意识的塞而不通。因为康、梁、严的思想骨子，是借学术来搞政治，“心地少有清虚宁静”、“粗浮”、“东西涂抹”，“康有为终成一浮乱名流，自暴自弃”，其后果是学风与士风的“浅衷薄植，诳耀天下”。关键乃在于他们对于中国哲学文化的大本

---

① 《十力语要》卷四。

② 《十力语要》卷一。

大源，并无真正的知解。熊十力认为文化生命的畅通健康，首先在于文化意识的见本见体。他常发誓不做名流，不讲演，不为报刊写文字，潜心为文化理想的疏通而做深入细致、自本自根的学术准备。但是，熊十力为什么能在“举世滔滔”皆“康梁习气”的近代学风中看出问题来的呢？由此我们可以进而追究他更深的存在感受。《十力语要》中有一段自述生平的很重要的记载：

先父……学宗程朱，一生困厄，年亦不永。余年十岁，先父已患肺病，衣食不给。余为人牧羊。先父常叹曰：“此儿眼神特异，吾不能教之识字，奈何？……”逾年，先父病深，竟不起。临终，拂不肖之首而泣曰：“汝终当废学，命也夫！……”余立誓曰：“儿无论如何，当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父默然而逝。余小子终不敢怠于学，盖终身不忘此誓也。……吾亦自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心。私欲潜伏，多不堪问。赖天之诱，忽尔发觉，无限惭惶。又自察非事功之材，不足领人，又何可妄随人转。于是始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余自三十五以后，日日在强探力索之中。四十左右，此工夫最紧。……余四十后，大病几死。余誓愿尽力于先圣哲之学，日以此事自警。<sup>①</sup>

现代从事传记学研究者，认为“传主口述”并不见得就是最真

---

<sup>①</sup> 《十力语要》卷三。

实可靠的材料。但是这一段自述生平，至少具有心理上的真实性，或自我反省的真实性，即熊十力人格中自重、自负、自尊的存在感受的内在因素的形成，以及他的一份长期坚执的自我期许。我们尤可注意的是：一、熊十力出身于一个理学世家，他的父亲对他从小就寄予了一份不凡的期待。或者说，其父一生所积贮的圣学血脉，首先是作为一种高期望值而贯注、内化于熊十力人格的。二、熊氏十一岁时的“志学誓言”，不同于一般如中国人文传统上说的“吾十五而志于学”，而是深具个人生命的真切痛感，即一种“学而未能得其应学，而又不能忘其所应学”的原初缺憾，这一原初缺憾是他一生“强探力索”为圣人之学的内在生命动原。关于这一点，熊氏弟子朱宝昌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回忆：“他的父亲是一位讲理学的老儒，早就发现他不是真正的笨，而是大有出息的。说到这里时，他便对我号啕大哭，像个小孩子似的痛哭。”<sup>①</sup> 我们仔细想想熊十力为什么这样痛哭，或许可以对他有真正的同情的了解。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儒者都是自任以天下之重的，而为什么熊十力特富于学统道统的担当精神，这一精神表现得如此紧张、坚决、强大。三、由此我们可以了解熊十力由革命转入学问的内在生命导向。如果我们说熊氏只是由于对于革命深感失望而转向，就没有真正看清楚他生命中的那个“原点”；如果我们认为因为熊十力早年参加革命，所以他的学问才有大气，这就不免本末倒置。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一自述具可靠的研究价值，因为家世信仰、家国通一的中国学术文化特质，我们在熊十力、陈寅恪等近代学人身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

---

<sup>①</sup> 《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明。<sup>①</sup> 后人欲了解近代学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

由此我们要回到一开头所说的那一个“造”字上。从存在感受的角度去了解，我们会发现说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也好，说他是一个自我膨胀得特别厉害的“狂人”也好，都不能真正同情的了解他。单单从人的血气之性、气质之性来认识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是很简单化、很随意的做法。熊十力确是非常有气魄，正如牟宗三所回忆：“清、奇、秀、逸之气，爽朗明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那纷纷扰扰、卑陋尘凡，作狮子吼。”<sup>②</sup> 但他的“气”正如孟子所说的浩然大气，是直养，是由集义的功夫达成。熊十力曾明白说过：

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眼，一切如量。<sup>③</sup>

余英时先生将这个例子，作为“文人相轻”、“唯我独尊”、“目无余子”、“自郐而下”等传统心理积习在熊十力身上的体现，又作为是受近代科学一元主义“知性的傲慢”所刺激而产生的一种“良知的傲慢”，不是没有一点道理。<sup>④</sup> 但是在真正理解熊十力的意义上，则不免说得太“隔”。其实，熊十力的“严判古今”，正是以养气的功夫来充实他的存在感受。比如

---

①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参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牟宗三：《我与熊十力先生》，《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1970 年版。

③ 《十力语要初续》，北台乐天，1970 年版。

④ 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年版。

他高度赞扬佛家有“大雄无畏”的生命风姿；他认为“宋儒力量终欠活跃”；又严判所谓“泾泾然小人之事”不可与“以天下为己任”者同论，都是在自家身上做功夫，在存在感受上做功夫，自我修炼一种“自任以天下之重”的人格力量。他首先是对己的，其次才是对人的。正如他明确说的：“深知人生责任重大，必以独善自私为可耻。”“唯我独尊者，不自暴弃之谓也。”这里，跟“傲慢”的所谓“心理构造”其实并不相干。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对于他所说的“四十以后，日以传先圣之学自警”一句话，有真正的理解；不能对他所说的“学者必养成挺然绝俗之资，必具有囊括大块之概，规模宏拓、志意深远，不贪小成，不甘凡近，然后能下极深研几之功，任继往开来之业”，有真正的理解。也不能对于他“对哲学有铭心刻骨的爱好”的真正哲学家的气质，有真实的理解。

正是在自家身上做功夫，所以他对于人生的负面因素，对于人性的阴暗面，有着深刻的体会。这里要说到另外一个误解：熊十力哲学讲“昭明本心”，以及全部新儒家都讲道德理想主义，因而有人认为他们只是在伸张民族感情，只是在传统“遭遇”现代化之际，对于传统的一种护卫态度，他们对于人的生命、存在中的阴暗面、隐曲面缺乏正视。其实这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的。《十力语要》记载一件事：“六年赴沪，舟中无聊，友人以《儒林外史》进，吾读之汗下。觉彼书中之穷神尽态，如将一切人，及我身之千丑百怪，一一绘出，令我藏身无地矣。准此，何须含蓄，正恐不能抉发痛快耳。”<sup>①</sup> 熊十力的思想深处，恒有一种对于生命的另一面的敏感与自觉反省。甚

---

① 《十力语要》卷四。

而可以说，他的学问世界的展开，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于阴暗的反省开始的。前引“自述生平”一段，即明确说过：“余非无嗜欲者，余唯以强制之力克服之。到难服时，则自提醒平生誓愿所在。……先圣之学，广大悉备，而一点血脉，只是反求诸己四字。”又一处讲自己儿时多病，常起怕死之念，“三十左右，此念又经一度炽然。大约此念起时，能转一新方向，便可无虞，所谓死中得生也。若此念牵缠，而不能放于日新自得之场，其死必矣”。又《语要》有一处论“习心”：

习心者，凡过去一切欲与想等，皆有余习不绝，潜伏而成一团势力，总名习心。所谓下意识是也。此无量习心，殆如滚滚伏流，行于地下，鼓荡跳动，一有罅缝，即喷薄而出。当吾人本心亡失之际，正是习心乘机争出之机。……朱子所谓荒忽无常，正是其象。夫人皆有本心，而不知操存之，则天君亡。（天君谓本心）而无量污浊习心，纵横出入。方寸间，为群魔竞技之地，其苦可知。舍则亡之状乃如此，则操存之功，不可顷刻舍也甚明。<sup>①</sup>

说得如此亲切真实，正是由一番反己体认的功夫而出。又《语要》论“生命的创痕”：

人生在社会上呼吸于贪婪、残酷、愚痴、污秽、卑屑、悠悠、杂乱种种坏习气中，他的生命，纯为这些坏习气所缠绕、所盖覆。人若稍软弱一点，不能发展自家的生命，

---

① 《十力语要》卷三。

这些坏习气便把他的生命侵蚀了，浸润了。而这些坏习气简直成了他的生命、做了他的主人翁，其人纵形偶存，而神已久死。

凡人当自家生命被侵蚀之候，总有一个创痕。利根人特别感觉得。一经感觉，自然奋起而与侵蚀我之巨贼相困斗，必奏廓清之功。若是钝根人，他便麻木，虽有创痕，而感觉不分明，只有宛转就死于敌人之前矣。<sup>①</sup>

这一段，异常鲜明警人。他一定有真体验，才说得如此。人若稍软弱一点，不能发展自家的生命，生命要有一种强度的。你的生命没有强度，就容易自己受伤。这里的创痕一语，讲得真好。对于生命的负面影响极富于深切的体验。人的生命，来到世间，不止是要跟外在的东西搏斗，而且要跟自家的生命相搏斗。这是熊十力存在感受极深切的一个层面。熊十力的存在感受，不仅是感一时一地之存在，更是对生命本身有所感；亦不止是对于中国文化与时代遭遇而有所忧患，对“人心死、人气尽、人道亡”的现实问题的忧患，而且是对于人类根本问题的忧患，对于人的生命中的种种无明私欲感到忧虑。这是一种当下的存在感受。他的哲学，可以说是体认而引归身受，又由身心实践、生命内核，蒸发而出。将这一真实的身心性命之学，说成是所谓“良知的傲慢”，只表明说此话的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精义，仍然太隔。

总上所述，熊十力的存在感受可分为四项：（一）来自时代的忧患意识。（二）来自历史的文化意识。（三）来自家世信

---

<sup>①</sup> 《十力语要》卷四。